

#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、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师曾志:99 公益日的“朝内看”和“朝外看”

■ 本报记者 高文兴



本届 99 公益日在 9 月 9 日晚落下帷幕,在今年因疫情已消耗很大一部分公众捐赠热情的情况下,本不太被看好的本届活动最终各方面数据相较上一届仍实现了涨幅。由于慈善会系统的全面参与,不少行业从业者和专家学者对这一动作带来的影响展开广泛讨论。此外,已连续举办六届的 99 公益日对行业及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,也是值得观察的话题。

就此,《公益时报》记者专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、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师曾志,她曾作为专家对今年 99 公益日规则进行评议,并且多年以公共传播的角度研究公益现象。

《公益时报》:今年由于上半年疫情消耗了公众很大一部分的捐赠热情,此前也有部分行业从业者及专家学者对本届 99 公益日的公众筹款部分不抱太大信心,但最终从公众捐赠额到参与人次等的各项数据又再次实现增长。能从公益传播的角度对这样的结果做出解释吗?

师曾志:就我观察,我好像没有听到(行业从业者和专家学者对今年 99 公益日公众筹款额没信心)。从我的观察来看,到现在来讲,99 公益日让公益“出圈”是其最大的亮点,越来越多地让公益行业以外的人参与公益。通过最近几年的 99 公益日,公益真正地实现了传播学上所谓的从个体传播、群体传播向大众传播、社会传播发展,过去不理解、不了解公益的人越来越多地受启发,逐渐成为公益捐赠的主力。这是第一点。

第二点,公益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生活方式,尤其是今年经过了疫情,我们更多地看到了“人心向善”的可能性。然而这种“人心向善”可能性的增大,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技术带来的便利。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等各方面条件的成熟,以及捐赠平台游戏规则的设置,带来了 NGO 组织、相关政府部门、互联网企业、个体在公益参与度上的增长。也就是

说,“人心向善”的实现,离不开平台游戏规则调动着社会各方面资源和力量的能动性。

所以,我个人认为,今年 99 公益日的好成绩与技术、平台能够将“人心向善”的精神激发出来是有关系的。当有了更好的工具能更方便、快捷地实现“人心向善”时,99 公益日的成功便是顺理成章的。

《公益时报》:你刚刚提到公益“出圈”,那么 99 公益日六年以来对公益行业以外的群体起到的影响有多大,你是否有所观察?

师曾志:我觉得,最重要是让行业外的群体认识到了公益的理念,知晓公益在社会上存在的意义。如企业等各类组织机构,越来越多地愿意自发从事公益,而个人则越来越觉得公益是一种自我选择、一种人生活方式。我们一直说社会是“有机团结”(与“机械团结”相对,更多地强调成员的异质性和基于相互依赖,而非基于集体意识)的,而通过 99 公益日这样一个活动,我们看到了社会的能动性,人们靠情感、靠彼此的认同与信任,表达了帮助他人的意愿,也给了自己得到满足的可能性。

《公益时报》:今年是慈善会系统参与 99 公益日的第二年,业内对此的评价褒贬不一。以徐

永光为代表的部分人士认为管办慈善改革转型融入民间,为官民合作共赢提供了条件,而反对者则认为是进一步挤占民间慈善资源。对此,你作何评价?

师曾志:我同意徐永光的观点。

不少人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,要把公益慈善分为“官办”和“社会”,这其中隐含的意味是认为,官办的就一定办不好公益慈善,而社会组织就一定能够办好。

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,我们所谈论的公益所涉及的方面是多元的,并不简简单单止于筹款,更重要的是项目的执行,我们不能就筹款一个方面就对孰是孰非下定论。如果一个项目不违背腾讯公益的规则,全程做到了开放透明,尤其是杜绝了那种临时抓来一笔钱套取配捐的行为,而是靠自己的动员能力获得了善款,又经受了后面对其项目执行的评估、监督,我认为这样的项目就是可以的,它达到了解决社会问题、帮助弱势群体,尤其是在政府部门之外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,其意义也就达到了。

而且从腾讯公益的角度来讲,他们也更强调的是项目公开和项目的执行力,并一直在通过平台和技术手段保证这两者的实现,如果某个机构/项目没有达到要求,最终还是要受到惩罚

的。所以在我看来,要观察一个项目的整个过程,而不仅仅是筹款,不能简单化做出结论。

《公益时报》:那么,在慈善会系统全面融入后,你认为,草根 NGO 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来主动拥抱这一变化呢?

师曾志:从传播力上来讲,草根 NGO 要想在筹款上跟慈善会、公募基金会等大型慈善组织平起平坐,这是不可能的,这个要求也未免太高了,但是在项目执行、项目具体落地、项目专业能力上,草根 NGO 有其非常好的优势发挥空间,本身这类大型慈善组织的项目落实就是要与草根 NGO 协同、彼此共同解决问题的。并且,这类大型组织之所以有传播力、筹款力,也是因为它们依托于各类社会组织,因为后者给它们提供了更好的项目书、项目规划,项目的执行最终也还是要落在后者身上。

所以,我个人认为,还是要从全过程来观察公益慈善,让各个主体发挥其各自的主动性,而不要把草根 NGO 能“抢到”多少钱作为衡量其专业能力的标准,也不能因此说慈善会系统挤占了其他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,这是非常空洞的观点。

《公益时报》:99 公益日让不少公益机构每年一大部分的精

力都为这三天做准备,你对这一现象有何看法?

师曾志:99 公益日的重点之一一是提升小型社会组织各方面能力。对许多小型社会组织来说,工作人员仅有个位数,其体量和能量仅能支撑其完成这么多的工作量,让它全年都去募捐,反而是让它“小马拉大车”了。所以,还是要根据各个组织的实际情况去看,才能判断集中投入这三天的精力对组织的影响是好还是不好。

《公益时报》:你如何评价 99 公益日六年来对行业及全社会的影响?

师曾志:首先,我们要尊重一个企业的自我选择。对腾讯这样一家互联网公司来说,它只是做了它想要做的公益,一定代表了它自身的价值偏好,也仅仅是整个公益慈善事业浪潮中的一朵浪花,因此就不能苛求其对整个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承担起绝对的责任。

在腾讯的自我选择背景下,我们评价 99 公益日,须包含“朝内看”和“朝外看”两个方面。

“朝内看”,公益机构通过在腾讯公益平台上运作项目,提高了其各方面的专业能力,并训练出“开眼看世界”的思维,由此,公益机构实现了“进化”。再者,腾讯公益对行业的自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,这是有目共睹的。

“朝外看”,腾讯公益引导了公益的“出圈”,将公益的思想和理念传播到更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,这也是 99 公益日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。这个“出圈”也许没发生在公益机构一侧,而是让更多个体和企业等组织主动理解公益、参与公益,也启发和带动了更多企业以多种新形式从事公益,从而赋予了公益更多的形式、更多的发展空间。

## 95 岁院士捐款超千万资助学生

拿出毕生积蓄,95 岁的他捐款总额达千万元,最初捐款原因是什么?原本可以颐养天年的他,为何 81 岁时开始写书?与时俱进,学会网购的他购物车中都有什么?记者专访华中科技大学退休教授、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崑。

### 夫妇捐款总额超千万

今年 7 月 3 日,华中科技大学 95 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崑和 93 岁的夫人朱慧楠教授做出一项决定:向华中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款 400 万元,设立“新生助学金”,这笔“新生助学金”将在未来 5 年内,每年向 133 名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各资助 6000 元。

这 400 万元并不是崔崑夫妇的第一次捐款,在今年上半年的疫情中,他们曾以特殊党费的形式捐出了 100 万元,以老党员的身份支持武汉抗疫。

崔崑夫妇最早一次捐款是在 2013 年,那年他们向华中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出 420 万元,五年捐完,用于设立“勤奋励志助学金”。“学生必须勤奋,这都是贫困学生,但必须要努力学习。励志就是品德要好,自己知道要有公德、有爱国之心。”

2018 年,崔崑夫妇分批捐完 420 万元后,又为“勤奋励志助学金”追加了 180 万元的捐款,将每年资助的学生由 45 人增加到 60 人。

时至今日,崔口夫妇捐款总额超过了 1000 万元。

### 学生让他们坚定决心

最初让崔崑夫妇下定决心资助助学,是他们了解到学校里一些学生困难的经济状况。这些学生受到资助之后的反馈更加坚定了他们的决心。

“青年学生都有一个思想成

长的过程,在困难时期得到的帮助对他们思想很有用。”崔口回忆,资助的学生中有个女孩后来去广西支教,碰到一个农村孩子。“父母都不在了跟着爷爷奶奶,家里很穷,但孩子很乐观。她就要帮助这个小孩子,一个月两百块钱,鼓励他上大学。”

崔崑说,这些被资助的学生都有共同意愿,将来只要有条件也要做公益事业。“看到这些,我多高兴!我们两个人只要有四个学生,能够将来愿意像我们一样去帮助别人,就够本了。”

### 一件夹克穿了 30 年

崔崑 1948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机械系,1951 年至 1954 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班就读。后来,崔崑还到莫斯科钢铁学院进修,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金属材料专业人才。他的研究成果曾填补国内

空白,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。

1997 年,崔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,人称“钢铁院士”。当年的申报材料显示,他的研究成果所创造的经济效益超过了 2 亿元。

谈起自己的利益时,崔崑院士表示,奖金这对他来说没有吸引力,“只要我的东西能够得到应用,特别是还列到国家标准,我比什么都高兴。”

崔崑夫妇所捐出的 1000 万几乎是他们毕生积蓄,全部来源于工资和补贴。

崔崑夫妇一直住在学校分配的院士楼内,没有买房子,家具看上去也比较老旧。崔口的一件夹克甚至穿了 30 年,“我现在经常穿,为什么呢?因为它好,拉链都不坏”。

### 7 年撰写 200 多万字

2006 年,崔崑院士告别教学

与科研工作,81 岁的他开始写书。“我不能去工厂、不能做课题了,还能做什么贡献呢?写书。这就是我后半生把我的经历、所收集的资料整理出来贡献给大家,这比我搞几个新钢种出来价值还大。”

写书的 7 年,崔崑院士每天从早晨起来一直写到晚上,“我年龄大了,再不写写不出来了,所以有紧迫感。”崔崑表示,书写不出来会是一辈子的遗憾,“人这一生总要做一些有用的事。”

2012 年 8 月,崔崑院士用了 7 年的时间,独立完成了《钢的成分、组织与性能》的撰写。全书 200 多万字,1500 多页,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专著。随后,他又用了 7 年时间进行了修改补充,出版发行第二版。如今按照他的计划,再用五六年的时间出版发行第三版。

(据《科技日报》)